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殷子衡 张纯一合集

何卓恩 编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殷子衡 张纯一合集

何卓恩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子衡 张纯一合集/何卓恩 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人物文集系列)

ISBN 978-7-5622-5124-8

I. ①殷… II. ①何… III. ①殷子衡(1875~1957)—文集②张纯一(1871~1955)—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61 号

殷子衡 张纯一合集

编者:何卓恩

责任编辑:张建英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32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4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编者言

宗教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是辛亥革命研究中关注不多的一个面相。本集作者殷子衡、张纯一均为辛亥人物，又都在此前后皈依基督教，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殷子衡（1875—1957），湖北黄冈人，字子恒，号姜园。少从舅父吴贡三读书，在舅父影响下加入日知会，从事反满宣传，翻印和转运大量鼓吹革命之书籍。1907年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直至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破狱而出。曾参与汉阳、黄州革命政府工作，代订黄州临时政府章程。革命党内部政治纷争出现后，退出政事，转意于国民教化。殷子衡本为儒生，在狱中受刘敬庵影响，信仰了基督教，认为唯有基督教可将中国人根本救起，离开政治后任职武昌圣公会，著有《狱中记》、《中华婚姻鉴》、《达湛然和尚书》、《演讲集》、《中国哲学摭言》、《比较宗教学》、《皈依基督自述》、《中国基督教两大伟人》等书，另有《姜园日记》60册未刊。

张纯一（1871—1955），湖北汉阳人，字仲如，号觉义、证理。少时中秀才，喜读先秦诸子书，也曾博览新学。1904年执教武昌文华学院国文，以革新道德、革新人心与学生相勉。因该院为圣公会所办，不久皈依基督教，感到基督教为中国自救自强之道。刘敬庵筹组日知会时，邀请张纯一加入，参与演讲等宣传活动，并作军歌鼓舞革命热情，流传甚广。刘敬庵、殷子衡等日知会骨干被捕时，张纯一因躲避及时而幸免，后与教会人士一起参与营救活动。武昌首义发生时，张纯一任编务于上海广学会所办的《大同报》，积极参与了上海反清起义活动。后亦因政治纷争而不问政治，专心

于文化和宗教事业。张纯一民初宣传基督教不遗余力，但越来越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其中国化方面，即用中国释儒道墨诸家思想解释基督教，到20年代明确提出佛化基督教，著有《墨子闲诂笺》、《讲易举例》、《融通各教谈道书》、《耶稣基督释义》、《基督劝道义正》、《改进基督教之讨论》、《基督立教大纲》、《晏子春秋校注》、《国学阐微》、《删订福音新编》、《佛化基督教》、《武昌日知会事实纪略》等书。

本合集所收录的文字，旨在略窥二人从儒生到革命者再到教徒的心路历程。在整理过程中，对于错字，加〔 〕予以标注，脱字加〈 〉标注，对于难以辨认的字则用□表示，各个别明显文字错误则直接予以改正。本集没有收录他们的全部文字，原因是有些已经失传，或搜集困难；有些属于纯粹的宗教哲学论述，与辛亥革命关系不大。

搜集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张春林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研究生李周峰、易龙等往返奔波于国图、省图，做了不少复制和抄录工作，特此致谢。

何卓恩

于华中师范大学

2011年2月

目 录

编者言	(1)
-----------	-----

殷子衡文集

诗三首	(3)
狱中日记	(4)
附：孔孟心肝之前半	(17)
皈依基督自述	(22)
题刘静庵画像	(59)
中华婚姻鉴	(60)

张纯一文集

日知会之缘起	(93)
述归命基督之由及对教会之观念	(101)
宗教天演合论序	(107)
论祭祖墓	(108)
基督教外篇	(109)
答熊子真	(162)
答殷勤道	(164)
粪夫官僚比较表	(166)
基督教与佛教	(168)
基督之生命观	(170)
讲演语录	(172)
世界文化之归宿	(195)

七日来复	(201)
改造基督教之讨论	(203)
中华新基督学自序	(225)
呜呼愚谬可悯的基督教	(226)
后 记	(231)

殷子衡文集

诗 三 首

之一：血仇^①

大地沉沦几百秋，
烽烟滚滚血横流。
伤心细数当年事，
同种何人血此仇。

之二：明孝陵吟

携手孝陵高处望，
空余石马被斜阳。
六朝金粉烟花地，
流入人间作战场。

之三：唐子吊唐才常

天地虽宽不载君，
任流赤血洗乾坤。
同胞同吊同声哭，
何处召回爱国魂。

^① 殷子衡经刘静庵介绍加入日知会后，1908年在团风创办“滨江阅报馆”，利用墙报发表众多“诗传单”。本诗为“诗传单”之一，题目为编者所加。

狱中日记^①

何季达是时藏匿省垣探听消息，见日知会破案，连夜买舟东下，次晨抵黄冈之团风镇（予因萍醴事败，即投入团风高等学校，充舆地教习）。一入校门，不及坐，携予手至院落一隅，密告予曰：“武昌机关已破，刘敬安、朱松坪等均已被捕，昔日我辈与欧吉罗所谋从安南运输军火起义之说，恐今无望矣！吾侪宜远逃以避其锋。”时丙午十二月十三日也。予闻此言，心中难安，欲逃之远方，恐被捕之诸同志无人看顾，鄂事无人提倡。欲不逃，恐已又被拘，于事亦无济。实处两难之地，不能自决。

十二月十八日，有测海兵轮一艘，由黄州拘予舅父吴贡三，复至团风镇。予在是镇之紫荆山庙中，与霍雄飞、秦少溪商筹一切。捕兵二人迎面而来，问予曰：“殷先生在此否？”予疑系来捕己者，即应之曰：“他已回乡去矣！”随应随走，已与秦君离去庙门百步之外，见操场站立兵士多名，予疑益甚，走更急。突有二兵士抢步近前，大声呼曰：“那前面一位是殷先生否？请先生站着，我有话与你说。”予见兵士跑步来追，即止步，以目示意，嘱秦君遁去。兵士近前曰：“张宫保有命令，特派兵轮下来，请先生往省城去。”旋兵士飞步俱来，舁予左右胁，牵予长辮，予即叱之曰：“何用此为，男儿谋救国，岂爱惜生命乎？”由是捕予至兵轮，时舅父吴贡三已在舱中坐定矣！薄暮开轮，斯时夕阳隐树，愁云点空，鼓浪之声，不绝于耳。予兀坐舟中，百感交集（后闻是处学生见予被逮，蜂拥江干，望船痛哭，如群羊之失牧人，哀号不已），上望苍天，回思汉族，不自知涕之从何而出也。乃喟然长叹曰：“吾辈若死，我黄帝神明之胄，即我最亲爱之父老兄弟姊妹，有谁救援于陷溺中乎？我若不死，以予病后孱弱之身，又何能受专制酷毒之刑杖？”左右踌躇，愿为其易，遂于白浒山下，跃入江心，效鲁仲连之蹈东海，

① 此文录自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八章，原题“殷子衡的日记”，实为殷子衡事后追记。